

知识分子形象谱系里的变数

——评梁振华《我的博士老公》

马为华

(广州大学人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梁振华《我的博士老公》以一种清新的笔调塑造了梁鸿名这样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形象摆脱了以往知识分子形象谱系的固定化刻板化的印象,展现了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身上的新型要素,开拓和丰富了知识分子小说的审美空间。

[关键词]《我的博士老公》;知识分子;刻板印象;虚幻张力;女性目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2-0013-04

The Variable in the Image of Intellectuals

——On Liang Zhenhua’s *My Doctor Husband*

MA We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Liang Zhenhua shaped a unique intellectual image in *My Doctor Husband* with a natural style. It’s different from the stereotyp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spectrum; it showed the new characters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developed and enriched the aesthetic space of intellectuals’ novels.

Key words: *My Doctor Husband*; intellectual; stereotype; illusory tension; female perspective

梁振华《我的博士老公》讲述了博士梁鸿名从北京毕业后千难万险地找工作,到在徽城大学里立足,并且展现自己的才华,上电视主讲文化节目,锐意改革出版社,陷入师生恋等一系列不算跌宕起伏,但也非常有声有色的一段生活经历。这部小说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塑造了梁鸿名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时期以来甚至是 20 世纪知识分子形象谱系里的一个变数或者另类。

一 20 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谱系的几种类型

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很多种,学者杨继绳的观点比较清晰而切中要害,“知识分子是没有掌握行政

权力和资本支配权力,专门从事知识创新和知识文化传播的一族”^{[1]250},仅仅有知识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按照路易斯·科塞的说法,“即使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2]西方人常把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士志于道”,君子安贫乐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古今中外的文化都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超越性的要求,“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1]251}。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而主要是从功能上加以定义的,这种

收稿日期: 2015-08-28

作者简介: 马为华(1974-),女,新疆奎屯人,广州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功能决定了整个社会容易形成对知识分子很高的期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而一旦期待落空,又很容易形成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攻击:“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3]469-470。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是知识分子的运动^[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维甫等面对庸众,孤独悲凉的启蒙知识分子,一种是钱钟书笔下欺世盗名、精神低下、人格委顿、劣迹斑斑的知识分子。进入当代文学50-60年代,由于特殊的文化气候,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文学中都成了待改造的对象,新时期80年代张贤亮、王蒙、张炜、谌容等一批作家塑造了一大批民族脊梁式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理性坚强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精神,以独特的精神气质照亮了文坛。自80年代底开始,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知识分子曾经振臂一呼的理想形象迅速被边缘化,思想界不断对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批评和要求:“今天知识分子的最可悲悯的一面,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所信,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知识分子都走到了无所信的地步,那就确实是危机深重了”^[5]。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粘结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已百孔千疮,若是惟一担负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之职能的知识分子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并且再“反戈一击”,对于未来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难以摆脱自身责任的。^[6]“由于中国没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没有那种与官方对立的思想意识传统,没有民间传播的渠道,独立支持的坚卓者一向是罕有的。”^[7]

与此同时,文学创作领域里出现了大量解构知识分子精英神话的作品,如王朔、池莉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中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的恶意,将知识分子塑造了道德低下、猥琐不堪的伪君子。近几年来出现了好几部关于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如张者的《桃李》、邱华栋的《教授》,这些作品都用非常焦虑的笔触写到了知识分子的堕落:用知识换取权力,再用权力换取美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如《桃李》里的博士生导师邵锦文、《教授》里

的叫兽赵亮。这些作品毫无亮色,每一个细节都指向堕落与朽败,师生之间的潜规则、性交易。权钱交易、婚外情,所有社会上我们能想到的关于欲望及其堕落的可能性在这里都得到了极大的展示,并且由于主人公的教授、知识分子身份,那种触目惊心的效应又被加倍地放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和阎真《活着之上》则是用非常细致的笔触描写了在堕落的官本位的大学象牙塔里谋生活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困顿与不堪,《风雅颂》里杨科花5年时间清苦地研究诗经,携成果归来后,却发现副校长和自己的妻子有私情,但为了前途,他居然选择了隐忍,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被精神病”而返回自己大山深处的家乡。《活着之上》主人公聂致远,从名字上来看,非常知识分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但是从文本来看,主人公非但不宁静不致远,而且几乎完全陷入在各种一地鸡毛式的琐事中,发论文与版面费,跑课题,跑奖项,行政职位的争夺,等等,各种琐碎淹没了主人公,也淹没了文本,只是在小说开头和结尾拼贴式安上了向伟大曹雪芹致敬的空洞议论,显得大而无当而又干瘪无力。困顿与批判看似写作向度及立意相反,但却共享着一种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什么样生活的强大逻辑,从应该怎样的概念出发,小说必然会一根筋似围绕着“应该”的逻辑打转,文本就不会再有弹性和对可能性的想象力。但是知识分子果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或不应该地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吗?

二 摆脱虚幻张力的知识分子新形象

梁振华这部作品的题目看起来很有些幽默的味道,“老公”属于市井生活中的寻常称谓,“博士”曾经高居于象牙塔的顶端,两者搭配在一起有些突兀,但却很好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的位置,作家敏感地把握了这种位置,但却没有惯常的愤怒或者不平,不批判也不抱怨地写成了这样一部饶有情趣的小作品。

说它是小作品,是相较而言的,参照物就是前边提到的近些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都有着很大的野心与期待,他们并不属意于仅仅写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一定要从这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看出国家的命运,一群人的命运,梁振华小说里的主人公并不承担这些伟大的意义或负担,梁鸿名真的就像是社会的一份子一样存在着,并不因为博士身份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怎样活着或不应该怎样活着。这种把知识分子归位到社会生活、归位到某人老公的写法,却带来了知识分子形象谱系里的大变动。

这个形象首先脱落掉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小说里梁鸿名非常有才华,却因为太有风骨,而在京城找工作不顺,落魄回乡,遇到了发小、表弟田衡,田衡原来学习不好却混得风生水起,并且是他通过关系搞定了梁鸿名的工作。这样的开头很容易陷入同类小说常见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精神与物质对立的叙事设置,在这种设置中知识分子要么因为坚持理想而陷入困顿,如阎真的《生活之上》和阎连科《风雅颂》,要么就会抛弃理想拥抱现实彻底堕落,如邱华栋《教授》和张者《桃李》。而梁振华的这部小说并不孤立地考虑精神或者理想,而更注目于梁鸿名如何立足及开展生活的。

那些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来结构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家过于夸大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他们的人格力量,因而对知识分子的塑造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神化、美化或妖魔化的原则,布尔迪厄理性地指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里的被统治阶级”^[8]不只一位思想家指出消费社会里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命运与地位:“社会日益发展起来的官僚化整体及其不断加强的封闭性,以及大众文化的类似发展,将导致知识分子失去在近现代西方世界中拥有的地位。即使避免了极权主义的发展,知识分子最多也只能在社会的缝隙间发挥作用,在多少受到宽容的边缘地带生活,占领舞台中心的将是脑力技术人员、专业脑力工作者和各种各样的专家。那时将需要大量的生产工程师和灵魂工程师,但是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知识分子当然就成了无用的废物。存留下来的那些人,由于在有欣赏力的读者和听众中找不到共鸣,充其量只能成为早期文明残留下来的古董。”^[9]

按照学者陈思和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以庙堂意识为主导意识的士,五四以后则借鉴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出现了广场意识,而这种广场意识不过是庙堂意识的变体,“知识分子被广场的意象刺激着,在巨大的功名利欲和虚幻的英雄主义之中沉浮激昂,却没有考虑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价值在哪里”,“现代知识分子拥有一份知识技能,如同工匠拥有一份手艺一样,是一种谋生的工具。……知识分子没有特别的资本要求别人给予特殊照顾。”^[10]

无独有偶,学者陈平原 1993 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也强调了“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从政,否则开口即暴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

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我万一议政,那也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党纲领;也不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我以为近乎自作多情”^[11]。

学者们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但作家们还是秉持着旧有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来创作,而梁振华在塑造梁鸿名这一形象时,没有了以往作家的那种焦虑,能用一种平常心去观照知识分子。通过梁鸿名讲课出彩,进而上电视,并且改革出版社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知识分子可以凭借知识立足并开拓自己生活的新的生活样式,而这种生活样式不就是当下中国大多数高校老师生存方式的写照嘛!或许大多数教师可能没有梁鸿名那么精彩,但的确的确是千千万万普通如梁鸿名的老师凭借知识换取生活,同时不遗余力,潜移默化地实现着文化的默默传承。如同小说里写到的那个悲壮的老讲师一样,他到死都没有获取该有的职称,但却赢得了学生的热爱与良心的安宁平静,对他而言,传授知识、传承文化就是他的人生意义,无需更多外在的标准来评价。他同样不是英雄,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并凭借知识完满了自己,这种死而无憾的人生令人感佩与叹服。知识分子在小说里不再被意义和姿态绑架,因而别具一种清新亲切的人性化特点。

三 被女性看的男知识分子

知识就是力量,而通常我们提起知识分子时,脑海里浮现出的也多半是个男性形象,知识分子小说绝大多数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叙事者一般也是男性,女性在作品中通常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是为了塑造或衬托男性知识分子而出现的人物,因而通常她们不具有主体性,要么是伤害或引诱知识分子的荡妇情人舞女骗子,如《风雅颂》里的杨科妻子、《桃李》里的各色女性形象、《教授》里的小姐形象;要么是非常现实、非常物质化不断给知识分子加压的另一半,如《活着之上》的赵平平;要么是臣服于知识分子魅力的纯情女子,如《风雅颂》里的玲珍、小敏,这种极端的形象和那种类型化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对称的。这些小说基本上是全知全能叙事,依据作者对笔下主人公或批判或同情的态度选择叙述者,透露出作家的叙事声音,而从这

些叙事声音的背后,你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作家所持有的那种“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的观念。

梁振华这部小说的叙事者是主人公的妻子,这样一种叙事眼光和角度别有意味也很有趣。“叙述者是什么小说、任何叙述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12],“叙述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文本以特征”^[13]。

梁鸿名妻子这一叙事者身份,决定了小说是从家庭这个角度去看待博士老公,这个叙述视角至少有两个功用:首先非常有效地避免了男性知识分子叙事中因为过于自恋而带来的英雄主义膨胀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偏颇,其次也避免了单向度地将男性知识分子抹黑为堕落下流、庸俗不堪的形象。

通常在小说中,男性都是观看者,而女性则是被看者,而这部小说里却出现了一个女性看男性知识分子的叙事框架,尽管仅仅还只是个框架,小说叙事者并不是掌控全文的中心,中心人物依然是知识分子梁鸿名,而且在小说的主体部分里大多还是使用了梁鸿名的视角,但由于这个女性目光的存在,就有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尽管这种声音还不是那么清晰。这种女性的目光在文本中也并不炯炯有神,但却真正赋予了小说一种对话的感觉:小说里描述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由男性构建的,因而梁鸿名可以功成名就,可以志满意得,也可以赢得女学生的追求,而她的妻子也真的可以感觉到梁鸿名功成名就之后的冷暴力,并且切切实实地做出了反抗。尽管梁鸿名在生日那天并没有和女学生发生关系,邹琴还是非常尖锐而又无奈地苦笑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种精神出轨,和逢场作戏的身体出轨比起来,你这才是对爱情,对家庭的背叛,最彻底的背叛……”^{[14]106}在梁鸿名追问邹琴为什么要离婚的时候,邹琴有一段反省:“从我和你在一起那一天起,我就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全世界,什么事都是围着你转的,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以你为中心的,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你做什么,我就配合你做什么,我把自己给丢了。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单独的人看待过,你只把我当成给你洗衣服做饭的妻子。但我醒过来了,我是邹琴,我要有自己的生活,哪怕这生活是难的是苦的,在我想明白这一刻起,我才看到了整个世界,也看清了我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14]128}在通常的知识分子小说里,女学生的崇拜往往都是给男主人公增加威望值的绝好桥段,甚至也不乏男性以

爱情的名义舍弃婚姻,妻子又歇斯底里不肯放手的老套情节,而在这部小说里,由于女性叙事者的存在,这种套路化的桥段和情节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追求自我,毅然离婚,走出无爱困境的结局。小说也是行进到了这里,才会让读者猛然意识到这个女性叙事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功能,而是作家严肃思考的一个结果与设置,从这种设置中,可以看出作家自愿让渡了虚幻的男性权力。由于这种让渡,小说的叙事空间变得非常丰富和开放。小说结尾,邹琴面临着前夫的再次求爱:“我的博士老公,不对,是前老公又向我求婚了,我还没有想好用什么方式来回应。真的,连我自己都好奇:我们的故事是结束了,还是才刚刚开始……”^{[14]140}我们愿意也有理由相信关于知识分子的新型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 [1] 杨继绳.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 [2] 许纪霖. 另一种启蒙[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8.
- [3] 保罗·约翰逊. 知识分子[M]. 杨正润,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4] 张朋园.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5.
- [5] 摩罗. 王晓明论[J]. 中国当代作家评论,1997(5):29.
- [6] 王力雄. 自由人心路[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35.
- [7] 林贤治.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J]. 书屋,2000(3):27.
- [8]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5.
- [9] 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郭方,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82.
- [10] 陈思和. 陈思和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177-178.
- [11] 陈平原. 学者的人间情怀[J]. 读书,1993(5):35.
- [12] 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
- [13] 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
- [14] 梁振华. 我的博士老公[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黄声波